

伙伴关系:新时代中阿政治合作的 互信构建与机制建设^{*}

苏 欣 张玉友

[内容摘要] 新时代中阿政治合作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和强大的推动力,前者包括长时段的历史交往、全球权力结构的变迁和相似的外交理念,后者包含相互协调的战略预期、经贸预期和安全预期。为构建和加强政治互信,中阿采取了经济与人文交流、高层互访和政治宣示等三条路径,政治合作内涵更加丰富。当前,中阿政治合作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政治磋商机制、多层次促进机制和国际舞台协作机制,并开展了诸多实践。中阿政治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双边经济、贸易和人文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解决地区热点问题,而且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当前,中阿政治合作受中东“和解潮”与“冲突潮”双重影响,并面临着中美战略竞争和地区形势动荡等挑战。

[关键词] 中阿政治合作 政治互信 战略伙伴关系 新型国际关系

[作者简介] 苏欣,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玉友,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政治合作既是战略合作的基石,又是评价战略合作水平的重要标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方面差异甚大,但双方的合作取得了良好成效。中阿之间既未发生过重大的冲突性事件,也未结成排他性的

^{*}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项目编号:21VGQ009)和2022年度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美国和伊朗的制裁与反制裁斗争研究”(项目编号:22JK0159)的阶段性成果。感谢论文修改过程中评审专家和编辑部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军事联盟,而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形成了政治伙伴关系。近年来,国际和地区局势发生了深层次变革,巴以冲突、中美战略竞争、俄乌冲突等因素相互交织,但中国和多数阿拉伯国家仍将对方上升到战略合作伙伴的地位。自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之后,中阿政治合作又在2022年12月有了新定位——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阿拉伯国家是中国开展大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一环,当前中阿政治合作既有机遇,也面临挑战,有必要对此展开深入研究,以为更好地推进双边合作提供理论支撑。

一般认为,中阿政治合作指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内,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发展的合作关系,主要包括在地区冲突解决、民主、人权、领土安全、治国理政等政治议题上双方所持有的共同外交政策或立场。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中阿双方至今共召开了九届部长级会议。在双方达成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宣言》《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行动计划》和《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中,均将“政治合作”视为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的重要基础。政治合作是中阿整体合作的基石,在安全、科技、经贸、人文等领域也发挥着引领作用。

从当前国内外学界关于中阿关系的研究看,国内学者重视经贸关系研究,国外学者重视安全研究。就政治合作研究而言,李伟建、孙德刚、丁俊和牛新春等国内学者从中阿合作论坛的视角探究了中阿政治合作的内容、动因和机制。^①伊扎克·希霍、约翰·卡拉布雷斯、穆罕默德·奥利马特、穆哈迈德·胡威丁、蒂姆·尼布洛克、叶海亚·祖必和与乔纳森·富尔顿等国外学者从中国对中东外

^① 李伟建:《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基础、现状与趋势》,《西亚非洲》2018年第4期,第3~20页;Degang Sun and Yahia Zoubir,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Conflict Resolu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 Case of Quasi-Mediation Diploma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7, No. 110, 2018, pp. 224~243;牛新春:《关于中阿合作机制的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3期,第41~48页;孙德刚:《论21世纪中国对中东国家的伙伴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7期,第106~130页;丁俊、朱琳:《新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机制、成就与意义》,《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3期,第26~48页;孙德刚:《中阿命运共同体的机制构建与发展前景》,《当代世界》2023年第1期,第46~52页。

交的宏观视角探究了中阿政治合作的安全因素。^① 整体而言,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均有所涉及政治合作,但仍缺乏对该领域的专门研究。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中阿官方文件、中阿领导人讲话等资料,以伙伴关系为抓手,对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阿政治合作的互信构建和机制建设展开研究。

一、中阿政治合作的现实基础与推动力

新时代,在中阿共同努力下,双边政治合作在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迈向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阶段。新时代中阿政治合作的现实基础与推动力,实质上是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动因和逻辑问题。

(一) 现实基础

现实基础是指促进事物发展的最根本性因素。中阿政治合作的现实基础包括长时段的历史交往、全球权力结构变迁和相似的外交理念等三个结构性因素。

第一,长时段的历史交往。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指出,施动者/行为体在历史交往过程中会形成一种集体文化或者文化结构,这种规范性的结构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战略选择。据中国史书与阿拉伯史籍记载,中阿友好关系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尽管历史上中阿之间爆发过怛罗斯之战,但正是这场战役使得中国的造纸术能够西传,也催生了第一个游历阿拉伯国家的中国人。^② 自此以后,历经宋、元、明、清等时期的文化和经济交流,中阿两大民族间的文明交往一直未断。独立后的阿拉伯国家依然与新中国并肩奋斗、患难与共,双方的政治合作关系走向制度化。

第二,全球权力结构的变迁。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10年以来,随着难民问

^① Muhamad S. Olimat,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From Silk Road to Arab Spr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Jonathan Fulton,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Gulf Monarch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James M. Dorsey,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Venturing into the Maelstrom*,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Tim Niblock,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A Global Strategy Where the Middle East has a Significant but Limited Place," *Asia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Vol. 14, No. 4, 2020, pp. 481 ~ 504; Jonathan Fulton, *Routledge Handbook on China-Middle East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Yahia H. Zoubir, *Routledge Companion to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② 郭应德:《中国阿拉伯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49页。

题、恐怖主义和全球南方国家政府治理危机加深,国际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变迁。总体来看,美欧等西方传统大国处于守势,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均有所下降,而处于上升趋势的中国、印度、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有着较为强烈的参与意愿和能力,国际权力中心有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对中国来说,随着美日、美澳同盟进一步扩大以及印度不断崛起,中国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发展受到的阻力会越来越大,向阿拉伯地区拓展周边外交的“西向”政策成为了必要选择。对阿拉伯国家来说,自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欧美大国一直被视为“搅局者”。尽管长期以来,美国是沙特、卡塔尔、埃及、摩洛哥等国在该地区的重要“经济与安全保护者”,但实际上,从奥巴马时期起,美国就逐渐从该地区“退出”,转而采取“离岸平衡”战略。近年来,阿拉伯国家纷纷采取“东向”政策,寻求与中国的全方位合作,以突破“寻租经济”的陷阱。^① 总之,体系层次的权力结构变化为中阿政治合作奠定了现实基础。

第三,相似的外交理念。不同于历史交往形成的文化结构,理念原则往往根植于该国自身历史发展和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战略性外交理念,这与江忆恩提出的“战略文化理论”异曲同工。^② 近代以来,中阿两大民族都遭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都经历过长期的殖民统治。惨痛的殖民史促使独立后的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不干涉别国内政”“不结盟”等相似的外交原则和理念。中阿都曾经面临民族国家构建之困,这种困难不仅源自自身发展困境,更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干涉所造成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西方国家不断将西式自由民主、人权观、发展观、治理观等价值观强加给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迫使这些国家站队,对一些不听话的国家甚至进行政权颠覆。在这种共同困境下,中阿外交理念均倡导“公平正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西方大国恃强凌弱,支持世界政治文明多元化发展。

(二) 推动力

从中阿合作内容来看,能够推动政治合作的力量主要有共同战略预期、经贸

^① 包澄章:《阿拉伯国家“东向”外交的动因、目标及意义》,《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6期,第88~102页。

^② [加]江忆恩著,朱中博、郭树勇译:《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预期和安全预期。

第一,战略预期。2010年阿拉伯剧变以来,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仍处于“转型”进程中。动乱中的阿拉伯国家(如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苏丹)承受着美国的打压,政治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如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和黎巴嫩)受到美国关于“人权问题”“民主化改革不力”等舆论指责,阿拉伯君主制国家面临着被美国抛弃的压力。此外,处于“建国”进程之中的巴勒斯坦对欧美等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政策表示强烈不满。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中国也面临着来自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和科技等领域的全方位打压。对阿拉伯国家来说,与欧美以外的大国合作能够对霸权国形成“软制衡”,^①而中国正好能够且有意愿提供这类支持。在战略预期结构下,中国提供阿拉伯国家所需的战略资源,阿拉伯国家在中国核心利益和国际舞台上给予坚定支持,双方的共同预期是对美国形成“软制衡”。

第二,经贸预期。阿拉伯国家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加之内部存在诸多政治矛盾,阿拉伯世界的经济一体化水平一直较低。^②阿拉伯国家传统的贸易伙伴均是欧美大国,但贸易关系的发展一直受到人权、政治条件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以伊拉克和叙利亚为代表的重建期国家期望中国以更加公平的方式参与经济重建,以沙特、阿联酋、阿曼等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期望中国以纯粹的贸易与投资方式参与本国的“愿景项目”^③,促进其经济多元化发展。对中国来说,阿拉伯世界是一个拥有4亿多人口的广阔市场,商品贸易、能源供给、设施建设、工程承包等都是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重要经济利益。在经贸预期结构下,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进入阿拉伯国家市场,阿拉伯国家也能够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取巨大的经济和发展利益。

第三,安全预期。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关切主要集中在政权本身的安全,这种

① 孙德刚:《论中阿战略合作关系》,《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6期,第34页。

② Adeel Malik and Bassem Awadallah, “The Economics of the Arab Spring,” *World Development*, Vol. 45, 2013, pp. 296 ~ 313.

③ “愿景项目”(Vision Program)是指阿拉伯国家制定的中长期发展计划,如沙特“2030愿景”、卡塔尔“2030国家愿景”、巴林“2030经济发展愿景”、埃及“2030愿景可持续发展战略”、摩洛哥“经济起飞计划和2014~2020工业振兴计划发展战略”等。

安全的威胁源一方面来自地区的跨国思潮,如20世纪50年代以来流行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泛阿拉伯主义、共产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等,^①另一方面来自近年来大规模抗议引发的社会契约危机。在阿拉伯国家旧有的“福利换忠诚”模式已经失灵,而新的社会契约尚未建立。^②从威胁源的性质看,安全问题实质上是发展问题。因此,阿拉伯国家对外部大国的安全需求,除了传统的提供军事保护和稳定的军火供应外,更多是一种促进和平的发展模式。对中国来说,尽管阿拉伯世界与中国在地理上不接壤,也无领土争端,但该地区长期以来遭受恐怖主义侵袭,也是极端组织的策源地之一,这些极端势力不可避免地会向中国西北地区传播渗透,进而造成安全威胁。阿拉伯国家也有大量中国公民和华人华侨,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也是中国的安全考虑。因此,在安全预期结构下,中国有着巨大的参与阿拉伯国家安全治理的需求,中国提倡的“以发展促和平”^③模式更是契合了当前阿拉伯国家的安全预期。

二、中阿政治合作的互信构建

社会交往过程中,信任是稳定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也是导致合作关系形成、维持和破裂的重要变量。^④国际关系交往中,信任也已被证实是联盟形成、管理与崩溃的微观基础。^⑤阿隆·霍夫曼指出,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信任是指施动者愿意对合作对象的行为承担风险,而这种意愿主要是基于合作对象将“做正确的事”的信念。^⑥布莱恩·克里斯托弗·拉斯本认为,政治信任是国际关系中实现

① Gerd Nonneman, *Analysing Middle East Foreign Policies: The Relationship with Europe*,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 9~10.

② 田宗会:《“食利契约”与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现代福利社会》,《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5期,第81页。

③ 孙德刚、张丹丹:《以发展促和平: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理念创新与路径选择》,《国际展望》2019年第6期,第109~129页。

④ Diego Gambetta, ed.,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⑤ 尹继武:《联盟信任的生成机制》,《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4期,第36页。关于信任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参见Jan Ruzicka and Vincent Charles Keating, “Going Global: Trust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Trust Research*, Vol. 5, Vol. 1, 2015, pp. 8~26.

⑥ Aaron M. Hoffman, “A Conceptualization of 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8, No. 3, 2002, pp. 376~384.

有价值的外交和多边/双边合作的必要条件。^① 由此看出,互信构建是推动政治合作的重要路径。从国际关系理论对信任形成机制的论述来看,社会交换程度和共有威胁感知是影响互信构建的核心因素。^② 据此,在上文提出的中阿政治合作的现实基础与推动力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三种旨在促进互信构建的路径:经济与人文交流、高层互访和政治宣示(见表 1)。^③

表 1 中阿政治合作的互信构建与路径选择

社会交换程度 (公共外交)	经济与人文交流
	高层互访
共有威胁感知 (威胁感知的解决机制)	政治宣示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一) 以经济与人文交流促进政治互信

在双边关系中,政治关系的发展可以促进经济贸易、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医疗等领域的交往与合作。^④ 而贸易与文化交往^⑤也可以反向推动政治互信的构建。物质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结合一直是国际发展援助的重要理念,这能够促进双边政治信任感的提升。例如,日本在对埃及的发展援助中就注重经济互利与人文主义的结合,尤其是日本近年来对埃及教育和文化设施的援助,深得埃及人

① Brian Christopher Rathbun, "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ric M. Uslaner,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ru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688.

② 笔者参考了尹继武的联盟信任形成理论,他提出了四个影响联盟信任形成的因素:国家同质性、不确定性、社会交换程度和共有威胁感知。参见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③ 阿隆·霍夫曼、保罗·布鲁尔等学者从国内因素和冲突解决的视角提出了公共外交和建立旨在减少背叛后果的制度机制。参见 Paul R. Brewer, Kimberly Gross and Timothy Vercellotti, "Trust in International Actors," in Eric M. Uslaner,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ru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678 ~ 679; Aaron M. Hoffman, *Building Trust: Overcoming Suspicion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④ 安维华:《中国—中东友好合作关系稳定发展》,《西亚非洲》1998 年第 6 期,第 59 页。

⑤ 除了经济与文化外,能源、科技、医疗、金融等领域的交流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本文以经济和人文交流为例。

民的好感。^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注重中阿合作中经济与人文交流的相促进。在经贸领域,阿拉伯国家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主要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场和投资市场。近年来,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中阿贸易规模持续快速上涨,中阿贸易进出口总额从2012年的2224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的4314亿美元,十年间增长了近一倍。2023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已经达到1999亿美元的规模。^②投资方面,2004年,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量仅为1.8亿美元。而到2022年底,中国对阿投资存量达504亿美元。^③中国还重视在阿拉伯国家开展园区建设,如沙特吉赞经济城中国园、阿曼杜库姆中国产业园、中国—阿联酋产能合作示范园、中埃(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园区的建设均在有序地推进。近年来,中阿人文交流也实现了重要突破,体现在教育、学术研讨、图书出版、媒体传播和民间交流等多领域。^④阿拉伯国家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已超过17所,中国已有数十所高校开设阿拉伯语专业。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中阿新闻合作论坛、中阿丝绸之路文化之旅等多种人文交流活动顺利开展。

如果说经济合作是促进中阿政治互信构建的“水源”的话,那么人文交流则是中阿构建信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精神力量。^⑤经济合作本质是促进互利互惠,而互信的基础之一是使得双方能够获利。政治互信的根基在于民心相通,有效的人文交流是政治互信的重要推动力量。自2012年以来,伴随着双方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的深入发展,中阿政治互信程度大幅度提升。

(二)以高层互访促进政治互信

高层次访问是公共外交的主要路径。有实证研究表明,当A国元首或高级

① Ahmed Kotb, “Japan Boosting Egypt’s Development Efforts,” <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3/12/305717/Business/Economy/Japan-boosting-Egypt-development-efforts.aspx>.

② 杨韶艳、李明丽:《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贸易现状、结构和发展趋势分析》,袁家军、王和山主编:《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第四辑,宁夏人民出版社,第43页;《特稿:十年来,这一盛会见证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合作》,http://www.news.cn/2023-09/23/c_1129879593.htm。

③ 牛新春:《中阿经济合作:“80%魔咒”亟待打破》,<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303/10/WS640a8c6ca3102ada8b232d1b.html>。

④ 包澄章:《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文交流的现状、基础及挑战》,《西亚非洲》2019年第1期,第140~159页。

⑤ 吴思科:《文化交流与互鉴:中阿关系的基石》,《公共外交季刊》2016年第4期,第57页。

别官员(非私下访问)经常访问 B 国时,B 国公众就会对 A 国产生积极的态度,进而提升两国间的政治信任。^① 因此,常规性的高层互访机制是提升政治互信的重要机制,也是提升社会交换程度的重要方式。

表 2 中阿高层互访次数一览表(1957~2023)^②

国家	建交时间	阿访中	中访阿	政治合作类型
阿尔及利亚	1958 年	11	7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埃及	1956 年	18	14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沙特阿拉伯	1990 年	5	8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阿联酋	1981 年	7	4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苏丹	1959 年	9	3	战略伙伴关系
伊拉克	1958 年	4	1	战略伙伴关系
摩洛哥	1958 年	5	6	战略伙伴关系
卡塔尔	1988 年	5	2	战略伙伴关系
约旦	1977 年	9	2	战略伙伴关系
吉布提	1979 年	15	5	战略伙伴关系
科威特	1971 年	9	3	战略伙伴关系
阿曼	1978 年	1	2	战略伙伴关系
巴林	1989 年	3	0	重要合作伙伴
黎巴嫩	1971 年	2	0	重要合作伙伴
叙利亚	1956 年	3	1	战略伙伴关系
也门	1956 年	12	2	重要合作伙伴
巴勒斯坦	1988 年	14	5	战略伙伴关系
突尼斯	1964 年	4	4	重要合作伙伴
利比亚	1978 年	5	1	重要合作伙伴
毛里塔尼亚	1965 年	10	2	重要合作伙伴
索马里	1960 年	7	2	重要合作伙伴
科摩罗	1975 年	6	1	重要合作伙伴

图表来源:中国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人民日报图书数据库(1946~2023 年)。

① 这一研究排除了国际声誉较差的元首或官员,如伊拉克战争后的小布什。参见 Benjamin E. Goldsmith and Yusaku Horiuchi, "Spinning the Globe? US Public Diplomacy and Foreign Public Opin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1, No. 3, 2009, pp. 863~875。

② 本表主要统计中阿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首相、总理)以及正国级领导人级别的互访。阿曼苏丹卡布斯较少出访,属特殊情况。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为团结亚非各国开展反帝事业,周恩来总理就对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和苏丹等非洲阿拉伯国家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周总理对阿拉伯国家的历史性访问在当时得到了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和新闻媒体的高度评价,提升了阿拉伯国家加快与中国展开合作的信心。^①为了夯实成果,周总理又对埃及进行了两次访问,使中埃友谊在埃及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对阿拉伯各国人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②1957 年 12 月,也门穆塔基利亚王朝首相、王储巴德尔实现阿拉伯国家对华的首次政府首脑访问。此后,埃及、苏丹、也门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陆续访问中国,其中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更是先后 8 次访华。进入 21 世纪,尤其是 2012 年以来,中阿高层互访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交流机制。

表 3 美国总统访问阿拉伯国家的次数统计(1943 ~ 2023)

国家	埃及	阿联酋	沙特阿拉伯	科威特	伊拉克	阿曼	摩洛哥	卡塔尔	叙利亚	突尼斯	巴勒斯坦
次数	16	1	13	2	5	1	3	1	2	1	5

图表来源:“Presidential and Secretaries Travels Abroad”, <https://history.state.gov/departmenthistory/travels>。

结合表 2、表 3 和近年来的发展状况,中阿高层互访机制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高层互访次数多,整体效应好。自 1963 年以来,中阿高层互访次数已超过 200 次,中国与 22 个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成员国中的 4 个国家达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 10 个国家达成战略伙伴关系,与其他 8 个国家保持重要合作伙伴的关系,达到了政治合作无死角的状态。第二,高层互访兼具全面性与重点性。截至 2023 年,除阿曼外的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均到访过中国,平均每个国家到访次数为 7.45 次,超过 10 次的国家达 6 个,超过 5 次的国家达 16 个。中国

① 江淳、郭应德:《中阿关系史》,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32 ~ 333 页。

② 詹世亮:《周恩来三次访问埃及》,载安惠侯、黄舍骄、陈大维和杨建主编:《丝路新韵: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 50 年外交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3 页。

元首和政府首脑目前已经对20个阿拉伯国家进行了访问,总访问次数达75次,超过美国的50次(见表3)。此外,中国领导人对埃及、沙特、阿联酋、阿尔及利亚等重点国家访问次数超过30次。第三,高层互访成果丰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几乎每次访问阿拉伯国家或接待阿方元首来访,均能达成具有战略高度的合作成果。例如,2016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和沙特期间,将中埃和中沙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7年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访华,习近平主席就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四点主张;^①2023年,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访问中国,期间中叙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建立中叙战略伙伴关系。这些成果是提升政治互信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 以政治宣示促进政治互信

政治宣示是指一国政府对另一国关切的核心议题提出具有支持性的外交措辞、话语和解决方案。一般而言,政治宣示具有强烈的指向性和直接性,它是国际关系交往中提升政治互信的重要信号。积极的政治宣示能够快速有效地建立两国间的信任关系,消极甚至恶意的政治宣示会快速恶化两国关系。中阿针对彼此积极的政治宣示,推动了双方政治互信的构建。

中阿之间的政治宣示互动首先体现在双方达成的诸多文件上,这也是政治宣示的主要途径之一。《中阿合作论坛宣言》和《中阿合作论坛行动计划》明确指出“为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对方核心和重大利益的问题上相互支持”。具体而言,在中国关心的核心和重大利益问题上,阿拉伯国家强调支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一切形式的“台独”。在阿拉伯国家关心的核心和重大利益问题上,中方明确提出反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定居点和隔离墙,强调坚持和维护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利比亚、也门等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② 2022年12月,首届中国—阿拉

^① 《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集体合作站上新起点——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成就与展望》, <http://mideast.shisu.edu.cn/-upload/article/files/95/d5/159cb85b4c218c71efee7bb400c9/b5323cbd-a247-4fef-9296-e472c148c281.pdf>, 第4~5页。

^②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七届部长级会议多哈宣言》, http://www.chinaarabcf.org/lthyjwx/bzjhy-wj/dqjbzjhy/201606/t20160623_6836940.htm。

伯国家峰会发表《首届中阿峰会利雅得宣言》,进一步在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核心关切议题、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构建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等方面阐明立场。^①

除了通过官方文件表明立场外,中国政治宣示还有外交部发言人记者会、高层官员斡旋和联合国安理会投票等三种途径。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是中国在1983年3月建立的,旨在更好地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②该制度在向阿拉伯国家传递立场信息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如在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中方通过外交部发言人清晰地阐明了中国的立场和方案。高层官员斡旋制度是中国推动国际危机解决的重要方式。中国领导人和高层次官员每次访问阿拉伯国家、参与国际性磋商会议,以及在国际组织公开或闭门会议期间,都会利用各种合适的场合表明中国立场,提出中国方案。如此次巴以冲突期间,中方相继参加了2023年10月21日在埃及举办的开罗和平峰会、11月9日在法国举办的支援加沙平民国际人道主义会议等国际会议,并明确表达了中方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立场。^③中东问题是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中的热点议题。1971~2012年,中国所投的146次弃权和否决票中,68次是关于中东问题。^④1972~2022年,中国共使用了17次否决权,10次都是关于中东问题,均在2011年之后,^⑤充分反映了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变化——从不明确表态到尝试表达立场。

一般而言,中国的政治宣示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及时性。对阿拉伯国家发生的涉及重大利益的事件,中国每次都能在第一时间表明态度和立场,给阿拉伯国家以信心。第二,可接受性。中国政治宣示所阐述的内容具有较强的可

① 《首届中阿峰会利雅得宣言》, http://www.news.cn/2022-12/10/c_1129197331.htm?from_source=www.cbq.cn。

② 《王毅部长在外交部发言人制度30周年暨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上的致辞》, https://www.fmprc.gov.cn/web/wjzb_673089/zyjh_673099/t1108894.shtml。

③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隽出席巴勒斯坦问题开罗和平峰会》, 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sjxw_674887/202310/t20231022_11165638.shtml。

④ 漆海霞、张佐莉:《弃权还是否决——中国如何在安理会投票中表达反对立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5期,第113页。

⑤ 数据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网站统计而成,参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网站 <https://www.un.org/security-council/zh/content/veto-china>。

接受性,尤其在一些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上,中国强调的如主权至上原则、求同存异原则、政治解决争端,以及发展促和平等思想易被阿拉伯国家理解和接受。第三,针对性。在普遍性原则的基础上,针对阿拉伯国家不同的国情和具体问题的历史性和复杂性来制定具体宣示内容。

三、中阿政治合作的机制建设

任何双边或多边合作都需要机制化的平台。近年来,中阿双方一直在追求达成多领域、统筹型的集体合作机制,其重要基础是政治合作机制的建设。当前,中阿政治合作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多平台和多议题的机制化平台。

(一) 政治磋商机制

中阿之间最早的政治磋商机制可溯源至中国与各阿拉伯国家外交部签署的《定期政治磋商协定》。经多年努力,中阿间已发展出双边与多边并存的政治磋商机制。

在双边层面上,1996年,中国同摩洛哥建立定期政治磋商制度,首次确立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就双边关系和两国共同感兴趣的地区和国际问题进行磋商”的合作机制。1997~2009年,中国相继同沙特、阿尔及利亚、埃及、也门、科威特、巴林、阿曼、伊拉克、突尼斯、利比亚、苏丹、毛里塔尼亚、吉布提和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达成了建立政治磋商机制的协议。在双边政治磋商制度框架下,中阿双方就伊拉克问题、巴以冲突和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磋商。2014年以来,随着中阿关系的深化,中国同阿拉伯世界的一些重点和支点国家在“保持两国外交部政治磋商机制”基础上,细化和升级了磋商机制。2016年1月,中国和埃及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建立了特设政治磋商机制,主要包括联合国问题磋商机制、非洲问题磋商机制、反恐磋商机制等。^①2019年7月,中国与埃及举行首次非洲事务磋商,“双方就各自对非政策与合作、中国和非盟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五年实施纲要》,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77316/1206_677342/1207_677354/t1333937.shtml。

关系、非洲热点问题、在非三方合作等深入交换意见”。^① 2016年8月,中国与沙特签署了《中国政府和沙特政府关于成立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的协定》(简称“高委会”)。中沙高委会是两国政府间全方位、高层次、机制化的合作平台,其下设6个分委会,政治外交是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23年,中沙之间已经举行了四次高委会会议,政治和安全合作均是重点议题。^②

在多边层面上,政治磋商机制主要指向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集体合作。1996年和1999年,中国分别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和阿盟建立了常规性的政治磋商制度。2010年,中国与海合会建立了战略对话机制,定期就中东和平进程、叙利亚、也门、反恐等共同关心的政治与安全议题交换意见。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至今,已形成部长级会议、高官委员会会议(简称“高官会”)和高官级战略政治对话三级政治磋商机制。第一级别机制是起到引领作用的部长级会议,是现阶段中阿集体合作的最高级别机制,由各国外长和阿盟秘书长组成。从会议讨论的内容来看,政治合作是重点之一,各方主要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以及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会议所关切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第二级别是起执行作用的高官会,每年召开一次,主要是为了筹备部长级会议和落实部长级会议的决议和决定。^③ 第三级别是辅助性和补充性的高官级战略政治对话机制,和高官会在同一时期召开,主要讨论近期关切的重大议题。2023年第七次高官级战略政治对话就进一步推进中阿各领域务实合作、落实首届中阿峰会成果、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展开深入交流。

(二)多层次促进机制

中阿政治合作机制不仅体现在政府间的磋商制度,还包括政党交流、立法机构交流与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这三个次一级别的交流机制,这是2016年中国发布的《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出的政治合作机制。这三个层次的机制也贯穿于中阿政治关系发展历程:20世纪40至80年代,政党合作与交流是主要

^① 《中国埃及举行首次非洲事务磋商》, http://russiaembassy.fmprc.gov.cn/wjbxw_new/202201/t20220113_10490832.shtml。

^② 《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召开》, <https://www.imsilkroad.com/news/p/5295.html>。

^③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http://www.chinaarabcf.org/chn/gylt/t540745.htm>。

渠道之一;中阿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立法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逐渐频繁;新时代背景下,中阿地方一级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成为双方关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政党之间的合作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40至60年代,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与阿拉伯国家共产党、民族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的接触与交流,致力于中外政党合作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正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经过60余年的发展,在“新型党际关系”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与阿拉伯国家主要政党或政治组织均建立了开放式的交流关系。例如,在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的阿拉伯国家政党中,既有伊拉克共产党、约旦共产党等共产主义政党,也有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突尼斯复兴运动党等伊斯兰主义政党。目前,中阿政党交流已经形成了高层交往、理论研讨会和青年政治家交流等常规性的活动渠道。在高层交往方面,2015~2023年,中国先后接待了苏丹、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友好政党来访,中共代表团也多次前往阿拉伯国家进行访问。2023年至今,中共代表团已出访沙特、阿联酋等多个阿拉伯国家。在理论研讨会方面,主要平台有2012年设立的中国—苏丹执政党高层政治对话(至今已举办5届)、2016年设立的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至今已举办4届)、2019年开设的中阿政党专题研修班(至今已举办14期)。此外,阿拉伯国家政党还是2017年和2023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主要受邀方。政党交流是中阿政治合作的重要平台,为双方了解各自的政治生态提供了机会。

立法机构之间的交流是中国议会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外政治合作的主要活动机制。1988年,中国开始正式使用“议会外交”概念,主要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同各国议会和国际议会组织的交往。在中国外交分权体系下,议会外交的目标是利用自身优势和特点服务于总体外交,并非监督和制衡政府。^①从全国人大对外交往的活动来看,与西方发达国家和以金砖国家为主的新兴经济体的议会交流是主要活动。中国与美国、英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等国均建立了议会定期交流机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中阿集体合作的

^① 王理万:《中国外交分权体系下的议会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1期,第148~150页。

提升,全国人大与阿拉伯国家议会的交流也逐渐频繁。2010年以来,全国人大先后同沙特协商会议、阿曼协商会议、苏丹国民议会、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等15个阿拉伯国家议会建立了联系并开展交流,并与埃及人民议会建立了议会定期交流机制(每年一次)。2018年,全国人大与阿拉伯议会建立了正式联系。2023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会见阿拉伯议会议长欧舒米时强调,“立法机构交往对促进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并与欧舒米共同签署了全国人大与阿拉伯议会建立交流机制的谅解备忘录。^①由此可见,全国人大一直在加强与阿拉伯国家立法机构的交流,试图为中阿集体合作助力。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本质上属于人文交流的范畴,也是政治合作的基础内容。^②该领域的交流属于“顶层设计”的产物,由中央及各类论坛^③推出一套关于中国国家治理和发展的经验,由部委、高校、研究所和智库等机构共同推动交流工作的开展。中阿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重点集中在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民主与民生的关系、内部团结与外部干涉的关系、维护伊斯兰形象与打击恐怖主义的关系、坚持本国特色与借鉴外来模式的关系、传承民族文化与应对西方文化渗透的关系等多个方面。^④2012年,中方举办了第一期“中国—阿拉伯国家治国理政方略研修班”,参与者主要是阿拉伯国家的官员和政党组织成员。为落实习近平主席访问阿盟总部成果,进一步加强中阿治国理政经验交流,2017年,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正式挂牌成立。截至2023年10月,该中心已举办14期阿拉伯国家官员研修班,2期阿拉伯国家驻华外交官研修班,接待了多家阿拉伯国家媒体、智库和青年干部代表团。经过多年的发展,中阿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已经成为中阿政治合作与人文交流的品牌和亮点。

综上,政党交流、立法机构交流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属于三个不同层次,但

① 《赵乐际同阿拉伯议会议长欧舒米举行会谈》, 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08/28/c_1129831036.htm。

② 罗建波:《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历史、理论与世界意义》,《西亚非洲》2019年第4期,第3~4页。

③ 如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和中拉合作论坛等。

④ 张建卫:《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深化中阿合作关系》,《当代世界》2014年第12期,第44~45页。

相互交叠,都属于政治合作的促进机制,服务于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

(三) 国际舞台协作机制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协作已成为南南合作的一种有效模式。1971年,亚非拉友好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之后,双方在国际舞台上就诸多重大问题形成了默契性协作。中阿国际舞台协作机制主要包含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平台的多边合作和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三边合作”。阿拉伯国家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参与者,中东事务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议题对象”。随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深度和广度的扩展,中阿在国际舞台上的协作会愈加频繁,也能够为塑造新型国际关系准则树立典范。

就第一种机制而言,联合国及其下属的各类组织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展默契性政治协作的主要平台。从议题来看,中阿双方一般会遵循“核心利益、共同关切”原则,即针对各自关切的重大利益和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进行政治协作。从原则来看,中阿双方在遵循“求同存异、主权至上、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和政治解决”四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特定议题内的合作。自冷战结束以来,巴以问题、叙利亚问题、西撒哈拉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和索马里问题等均是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的热门话题。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框架下达成诸多共识。中阿双方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中国支持阿盟及其成员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作的努力。习近平主席连续多年向联合国“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致贺电。2002年,中国政府设中东问题特使,多次出访巴、以等有关国家,积极劝和促谈。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多次与阿拉伯国家联合推动以色列与 Hamas 停火。2023年11月,中国与阿联酋共同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巴以冲突局势进行紧急磋商,两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表示愿为重启和平进程一同努力。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框架下,中阿双方密切沟通、协调,共同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在核不扩散、军备控制、国际维和、粮食和能源安全等重大议题上,中阿支持彼此的

正当要求与合理主张,坚定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第二种机制——三边合作——是近年来中国开展多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交往中,三边合作(三边主义)是国际体系力量配比不均的产物,也是管理和提升三边关系的有效途径。^①对中国而言,三边合作可成为与发展中国家加强政治合作的重要路径。中阿之间没有冲突史,政治关系也非常友好,这为双方构建“中阿+”三边合作范式奠定了天然根基。阿拉伯国家面临的诸多问题在原有的框架内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中国可主动邀请第三方共同参与治理。第三方主要包括两类行为体:第一类是欧美大国。它们有长期的阿拉伯事务介入史,也是重要利益攸关方,中美阿和中欧阿在全球和地区安全治理中开展三边合作具有可能性;第二类是阿拉伯国家的敌对方。中国长期将“地区安全”作为中阿双方合作的重要事项,“倡导在中东实践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支持阿拉伯和地区国家建设包容、共享的地区集体合作安全机制,实现中东长治久安与繁荣发展。”^②2023年3月,在中国的直接调解下,断交7年之久的两个地区大国——伊朗和沙特在北京达成和解协议,这是践行“三边合作”的典型案列。未来可尝试建立中叙土、中沙卡、中摩阿(阿尔及利亚)等三边合作关系,以期解决双边冲突,甚至可以促进马格里布地区、海湾地区等次一级区域的一体化进程。“中阿+”三边合作范式是未来中阿政治合作的重点之一,甚至是“全领域”合作的新增长点。由此可看出,国际舞台协作不仅是推动中阿政治合作的重要机制,也是中国参与阿拉伯地区安全治理的主要路径。

四、余 论

中阿政治合作对促进地区和国际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第一,有利于促进双边经济、贸易、军事、文化、医疗卫生等领域的集体合作。政治合作是一切

^① 如博·萨普科塔,赵雪丹译:《中国—印度—尼泊尔三边主义:超越地缘政治的倡议》,《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4期,第70页;庞中英:《当前需要重新强调三边主义的重要性》,《华夏时报》2019年8月26日,第31版。

^②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 https://www.gov.cn/xinwen/2016-01/13/content_5032647.htm。

领域开展合作的基础,其目的在于通过增加政治互信避免分歧和冲突,并在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原则下,促进地区和平与经济繁荣,为集体合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中阿关系的发展始于政治合作,政治合作的发展又有效地推动了经济、人文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例如,中国与沙特直到1990年才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双方早在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军事、安全和人员交往方面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与双方的政治交往与合作有极大的关联性。^①在中沙政治合作促进下,2004年,海合会秘书长和6个成员国的财经大臣联合访华,签署了《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议》。2005年4月至2022年9月,双方就中国—海合会自贸区的建立进行了十轮谈判,致力于通过政治合作机制力促自贸区协议的达成。

第二,有助于推动区域热点问题的解决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中阿政治合作的重要议题之一是政治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一直以来,阿拉伯民族是一个兼具“整体性”和“地方性”特征的民族,^②这决定了阿拉伯地区呈现着形式上的“大一统”和事实上的“分裂化”。在具体热点问题解决上,阿拉伯国家难以达成统一的意见,甚至出现“各自为政”的局面。中国一直本着正确的义利观劝和促谈,不拉帮结派,不利用国家间矛盾牟取利益,而是着力于推动各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以“中阿政治合作”促进“阿拉伯国家间政治合作”,进而推动各次区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第三,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首先,中阿在国际舞台上的协作能够就某一国际或地区议题发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集体声音,形成合力,打破霸权国家的议题垄断,渐进式地推动国际规范的变革。其次,中阿政治合作可以牵动世界经济格局。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和新兴国家均希望与中国深化合作与协调发展。中阿政治合作将以整体力量参与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规则向有利于“全球南方”的方向发展。最后,中阿政治合作能够提升

^① Jonathan Fulton,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Gulf Monarch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 144.

^② 刘中民:《阿拉伯民族的三大特点及其对阿拉伯政治思潮的影响——以民族与宗教关系为视角的考察》,《国际观察》2010年第3期,第10~17页。

各自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地位的提升代表着话语权的提升。对阿拉伯国家而言,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是其争取国际合作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支持者。对中国而言,朋友越多意味着力量越大。

第四,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树立典范。中阿政治合作是一种基于伙伴关系的合作形式,强调“不针对第三方、不站队、不结盟”等原则。从实践来看,无论是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动荡时期,还是当今和平与发展时代,中阿政治交往一直在走不同于西方理念的合作模式,一直遵循着“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共同繁荣”的理念,这也是新时代中国开展中阿政治合作的指导思想。中阿政治合作是构建“全球南方”政治合作的一部分,也是践行新型国际关系准则的重要试验场。

当前,在中东“和解潮”与“冲突潮”双重影响下,中阿政治合作也面临内外挑战。第一,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明显,美施压阿拉伯传统盟友“选边站”。近年来,美军相继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反映出美国的中东战略呈加紧收缩态势,这为中阿深化合作提供了新机遇。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仍是该地区重要的域外大国,沙特、阿联酋、埃及等是美国重要的地区传统盟友,阿曼、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等均与美国签署了《防务合作协定》。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驻扎在巴林,中央司令部前线总部设在卡塔尔。美国曾公开表示,“海湾阿拉伯国家在与中国交往时,必须权衡其与美国同盟关系的价值”。^①2022年3月,美国与以色列、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和埃及的外长举行“内盖夫峰会”;7月,美国、以色列、阿联酋、印度政府首脑召开首届领导人峰会,建立西亚版“四方机制”。以上举措均是美国拉拢地区盟友、加深双边关系的重要举措。当前中美在中东日趋由“共生关系”转变为“竞争关系”,中东地区很可能成为美国对华遏制的分战场。^②美国在政治、外交和安全等具体议题上施压阿拉伯盟友,迫使地区国家“选边站”,这对中阿政治合作直接形成掣肘。

第二,地区安全形势动荡,阿拉伯国家政局不稳。在中东“和解潮”的大背景

^① Yoel Guzansky, “Either You are With Us Or Against Us: Gulf States Caught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either-you-are-us-or-against-us-gulf-states-caught-between-america-and-china-162741>.

^② 田文林:《中阿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3期,第25页。

下,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形势近年来有所改善。但受制于外部干预和内部矛盾的双重压力,阿拉伯国家的结构性安全问题并未明显好转。阿拉伯剧变以来,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社会变动延续至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等国仍处于动荡之中,黎巴嫩、约旦、苏丹、阿尔及利亚等国抗议活动影响政局稳定,地区部族和教派冲突频发,恐怖极端势力猖獗,气候灾害、难民、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加剧。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国际粮食供应减少及粮价暴涨,导致许多阿拉伯国家通胀加剧并影响政局稳定。2023 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阿拉伯国家陷入冲突与纷争。政局稳定是政治合作的前提保障,中阿政治合作深受阿拉伯地区和国家局势变动的影响。

中阿政治合作历久弥新,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引领下,未来中阿政治合作可在以下几方面继续深化:第一,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致力于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第二,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推动地区热点问题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斡旋敌对国家关系。第三,为加强全球气候治理、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建设、全球绿色可持续发展、全球文明对话等新领域的合作提供政策引导,为加强中阿全方位、多层次交往和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提供制度保障。